

“家庭癌症”，还要痛多久？

今年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定“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第20周年，我国出台反家庭暴力法也已近4年。有关社区从业者、法律人士和专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庭暴力被视作“家庭癌症”，亟须各地强化法律保障、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以法治之力消解家暴之痛。



“家庭癌症”折磨“社会细胞”

家庭暴力，对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不可言说的伤害。面对家暴，很多家庭成员选择“隐忍”，有的导致家庭关系破裂，有的造成恶性案件。家暴，成为折磨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癌症”。

山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王丽臻说，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有70%的施暴者不仅打妻子，还打孩子。

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杜惠欣告诉记者，有些妇女之所

以忍受家暴，主要是考虑离婚后经济压力大、对孩子成长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舆论压力大等原因。

“也有些妇女对家暴概念不清楚，以为只是简单的夫妻吵架，她们没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家暴。”杜惠欣说，事态严重后，才发现家庭关系已经破裂。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黄文劲说，因为家暴导致死亡的极端个案仍时有发生。他一直记得审理过一个案子：案发当天，女方曾自己跑出去说“他要杀我”；但最后还是被人劝回家。其实女方意识到人身安全遭威胁时，就不应该再回家，“那时她的家，已经不是避风港。”

“隐蔽性”滋生家庭暴力

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多数家暴行为仍受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没有及时得以介入、制止；另一方面，家暴行为中的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突显，高知家庭、公众人物群体的家暴行为也更具隐蔽性。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教授张雅维认为，相比普通家庭，公众人物、高知群体的家暴行为更难

为外人所知，而一旦被披露，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数据显示，“高知群体”并非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也存在被家暴的风险。广州市妇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年龄分布看，当地家暴案件当事人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26岁至59岁比例相对较多，而被施暴方文化水平既有文盲、小学、初高中也

有大学生、研究生，其中初中生比例较高，但本科和研究生占比也达11%。

张雅维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外扬”等思想在一些家庭中还很有市场，这与家庭成员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一方面，很多家庭成员并不了解反家庭暴力法，暴力发生时没有及时有效的保护证据，导致

举证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家庭成员在举报、报案中态度反复变化，也滋生了家暴行为的进一步恶化。

有关专家认为，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精神暴力，其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形式多样、缺少证据，在警方的后期调查中也出现了较大的认知偏差，导致难以得到及时救助保护。

法治之力还可以更给力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家务事，而是有法可依的违法行为。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建立家暴事件首接负责制……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预防、处置家庭暴力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反家庭暴力条例》也开始实施。

据王丽臻介绍，在治理家庭暴力过程中，妇联、公益组织等群体被形容为“娘家人”，多以心理咨询、婚姻辅导、法律咨询援助等介入服务为主；而公安机关、法院法律保

障等则被称形容为“舅家人”，可以及时出警、当场训诫，并在受理申请后及时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令是阻隔家暴的一道隔离墙。签发保护令只需有家暴危险存在，并不以家暴行为发生为必要条件。”王丽臻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1589份。

杜惠欣说，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长6个月保护期限，已经起到很大震慑作用，在6个月

内，社区工作者能与求助者积极协商保护措施。比如，如家暴后仍有跟踪行为，建议当事人立即报警；如果两人“相爱相杀”，依然决定回归家庭，也会给出自我保护建议。

山东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明敏说，山东开创性提出了家暴“首办负责制”。只要发生家暴或发现疑似家暴，家庭成员都可以到村委会、居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寻求帮助。“谁第一个接到举报和投诉，谁就要负责到底，以避免部门间扯皮。”

张明敏说。

黄文劲、杜惠欣等人建议，消解家庭暴力，法治之力还可以更给力。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有警察出警回执、验伤报告等，申请流程较长，而6个月保护时期相较于长期存在的家暴行为，依然较短；同时保护令内容聚焦“人身”，没有涉及“财产”，导致不少受害者迫于经济、生活压力回到家庭暴力中，致使保护裁定的效果大打折扣。他们建议，应适当延长保护期，在地方条例中加入财产保护的相关内容。

据新华社

“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结果发布

“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结果25日在广州发布，成都等10个地级（以上）城市、佛山市南海区等10个县级城市（区）当选。

今年的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的活动以“壮丽70年·幸福新时代”为主题，历时3个多月，经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专家评审等多个环节的严格遴选，成都、杭州、宁波、西安、广州、长沙、温州、台州、铜川、徐州十座城市被推选为“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黄埔区、宁波市鄞州区、深圳市南山区、江苏省太仓市、广州市南沙区、湖南省长沙县、舟山市普陀区、浙江省慈溪市十座县级城市（区）被推选为“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杭州作为唯一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城市，被组委会授予“幸福示范标杆城市”荣誉。

新华社副社长严文斌在当天举办的2019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说，新时代，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些成为人民幸福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增强人民幸福感的着力点，也是此次幸福感城市评价的重要标准。

据新华社

中国科研人员成功研发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

记者25日从扬州大学获悉，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在江苏省扬州市通过现场测试，今年将应用于小麦生产，从而带动中国农业技术向现代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

中国稻麦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超过1.12亿公顷。但是，在粮食作物生产中，长期存在劳动力紧缺、生产成本低、作业质量差等问题。

2008年以来，扬州大学科研人员针对这些问题，组织作物栽培、农业机械、智能控制、软件信息等领域专家，农业装备生产企业及一线农技人员，联合组成科研攻关团队，投入2000多万元，矢志研制智能化、无人化、多重复式耕播先进装备。

主导此项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说：“我们攻克了机械装备设计制造、信息控制精准施肥等多方面技术难题，并应用软件技术、北斗导航技术等，研制无人驾驶一次性完成施基肥、深旋耕、精确播种等九道工序的联合耕播作业机。至今，已取得10多项发明专利。”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在田间运行自如，可自动调头、转弯、后退等，一次旋耕深度可达22公分左右，且施肥均衡、播种深度和播种带宽一致。

据新华社